

中国的新移民与人口普查

[日]山岸猛

前言

改革开放后,中国大陆流往海外的人口有了增加。特别是在1986年出入境管理法公布后,前往海外的新移民人数急速上升。

首先看一下所谓的“新移民”是什么意思。某资料认为,“所谓新移民,系泛指改革开放以后从中国大陆、港澳台等地移居国外并取得永久居住权——绿卡的华人”(《华侨与华人》,1999年第二期,第70页)。另一份资料(广州市归侨联合会)也认为,“所谓新移民,一般指我国改革开放以来通过各种途径移居国外的人员,或称新华侨华人。他们中有的经过合法手续移居国外的;有的是出国留学、讲学、进修而居留不归的;有的则是非法移民而取得合法地位的”(《华侨与华人》,1999年第一期,第47页)。

这里所用的“新移民”的“新”是改革、开放后的意思,主要表示改革开放后为了移居海外而因私出国的中国公民。中国一般称之为“新华侨华人”。新华侨与新华人的差异似乎以有否居留国国籍来划分。实际上,是为了定居而出国,还是前往海外旅行及短期留学等的短期出国,很难做出区分。这里将保持灵活性,使用“新移民”这个词。另外,与“出国”分开使用的有“出境”这个词。“出境”用于从大陆前往香港、澳门、台湾的“同胞”地区时。实际上作为“出国”的开端,也有不少因私出境的人。这里也将注视与“出国”相关的“出境”并加以论述。

改革开放后,前往海外的新移民有了增加,这些情况多从片断的报道中得知。例如有从华侨出生地(侨乡)出国、出境探亲(海外华侨华人)的报道、在富裕起来的中国人当中前往海外留学的人增多的报道、来自福建等地区的偷渡者骤增的报道等。

关于整个中国具体的新移民人数及新移民输出地与新移民的社会经济变化,由于对研究对象的调查很困难,正规的研究极少。

本文拟根据改革开放后的人口普查(1982年、1990年、2000年)及中国公安局公布的出国、出境资料等,探讨一下与整体的新移民相关的状况。

一、新移民的变迁

中国的出国、出境者的增多是在改革、开放后,具体的是在1986年2月颁布了“中

华人民共和国出入境管理法”以后。该法第五条规定，中国公民因私事出境，向户口所在地的市、县公安机关提出申请，除本法第八条规定的情形外，都可以得到批准。相当于第八条所规定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等 5 个项目的人以外可以获得出国、出境批准。

这种情况表明在人的外流方面“开放”也在进展。该法实施的 1986 年后的中国大陆的因私出国者、获准出国者如表 1 所示。

表 1 中国大陆因私出国批准人数和出国人数（1996—2000 年）
(单位：人<总人数>)

年 度	出国批准人数	实际出国人数
1986 年	77 064	约 40 000
1987 年	107 297	53 995
1988 年	212 182	123 354
1989 年	238 301	132 727
1990 年	278 988	175 735
1991 年	377 380	207 146
1992 年	556 000	
1993 年	694 000	650 000
1994 年	705 000	573 000
1995 年	969 954	
1996 年	1 485 000	
1997 年		
1998 年	获准出国出境者 2 850 000	
1999 年	2 881 000 (获准出国出境者 429.4 万人)	
2000 年	3 109 000 (获准出国出境者 497 万人)	

注：根据赵红英所言，在 1978 年至 1995 年这 17 年期间，因私出国人数为 400 万人，其中移居海外者（移民）约为 80 万人。尤其是在 1985 年底公布“中华人民共和国出入境管理法”以后，因私出境者有了增加（赵红英：“近 20 年来中国大陆新移民若干问题的思考”，《华侨华人历史研究》，2000 年第 4 期，第 9 页）

资料来源：山岸猛：“侨乡与海外中国人、华人——以对外开放后的华侨汇款和新移民为中心”，山岸猛：《侨乡经济与海外中国人、华人》，八千代国际大学国际研究中心，1998 年 3 月，第 20 页；1999 年、2000 年的数值系根据《人民日报》2000 年 2 月 5 日、2001 年 2 月 13 日。

在出国者中也包括出国旅游者。随着经济的发展，一部分富裕阶层出现了，进入 20 世纪 90 年代后，便出现了出国旅游热。

1993 年出国旅游者共达 96 万人。这占了出境、出国者总数的 63.1%。其中前往香港、澳门的出境旅游者为 48.7 万人，而出国旅游者达到了 47.6 万人。出国旅游目的地是俄罗

斯、越南、缅甸等中国周边国家，前往这些国家的观光旅游者为 35 万人，占了整体出国观光旅游者的 70%，比 1992 年的 15 万人增加了 1 倍以上。除周边国家之外，前往泰国、马来西亚、新加坡等东南亚国家的旅游者也达到了 14 万人，这比 1992 年增加了 3.37 倍。

出国旅游者总数 1999 年达到了 193 万人，占了同年因私出国出境总数的 67.1%，在因私出国出境者中所占的比率居于首位，比自费留学出国者 8 万人、探亲访友者 53.6 万人等要多得多。2002 年，从中国大陆获准出国旅游的人数总共达 265.1 万人。

由于还有偷渡者等因素，因此很难准确地弄清这些海外观光旅游者和临时海外滞留者除外的新移民的情况。这里拟根据已公开发表的数字来探讨新移民的动向。

全国政协台湾、香港、澳门联络委员从 1996 年 11 月到 1997 年 5 月就新移民进行了专门调查。根据其内容，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大陆有 100 万人以上移居国外。广东省最多，约为 40 万人（1980 年以来每年平均 2 万人出境定居），浙江省有 25 万人、福建省有 10 万人以上、上海有 10 万人以上出国定居。

移居目的地并不一样。他们根据是否具备拥有海外亲属、或经济发达国家、或适合谋生、或对外来移民采取宽松政策的国家等条件来选择目的地。他们多移居到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新加坡、日本、英国、法国、意大利、比利时、秘鲁、巴拿马、委内瑞拉等国。

根据赵红英（中国华侨华人历史研究所副所长）所述，自 1949 年起 30 年期间因私出国的中国公民只不过 21 万人，但在实行改革开放后的 1978 年至 1995 年的 17 年期间，中国大陆公民因私出国的人数达到了 400 万人，其中移居国外的人为 80 万人。

特别是在 1985 年底，全国人大常委会公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出入境管理法”以后，因私出境批准人数有了增加。这与上述的有关因私出国者的表中的内容相一致。根据赵红英的叙述，如果改革开放后 400 万名因私出国者中的 80 万人是移居国外者，那么因私出国者的五分之一便是移居海外者。这些移居国外的人并不包含在后文的人口普查的“临时移居国外者”中。

二. 从人口普查看临时海外居住者

1. 人口普查所言的“临时海外居住者”之意

表 2 根据第三次人口普查（1982 年）、第四次人口普查（1990 年）、第五次人口普查（2000 年）归纳了临时海外居住者（出国留学、工作）的状况。表中的数值是在各次人口普查时不在中国的常住户籍所在地（市、县），而“在国外工作或学习，没有临时常住户籍（户口）的人”的数量。

关于其具体内容，在各次的“人口普查表填写说明”中写道：“驻外大使馆、领事馆的工作人员、各驻外业务人员及派遣到国外的专家、职员工人、劳务人员、留学人员（包括公费、自费）、实习生、进修人员和随这些人员出国的家属”等。

就是说，在人口普查所表示的、不在常住户籍所在地的“临时滞留国外者”中，偷渡者自不待言，在海外取得永久居住权的、真正的新移民并没有包括在内。此外，在人口普查的内容中包括短期（3 个月以上）出国进修学习者及探亲、工作、做生意的人，但这些人都是短期滞留海外、想要回国的人们，不是真正的移民。

表 2 1980 年代后各次人口普查时临时在国外居住（留学、工作）的中国人情况

出身省、市、 自治区	1982 年	1990 年	2000 年
	第三次人口普查时	第四次人口普查时	第五次人口普查时
北 京	12565	48955	39468
天 津	1353	3817	4881
河 北	2554	1475	4070
山 西	828	977	1688
内 蒙 古	272	1489	2698
辽 宁	2099	7261	38908
吉 林	552	2744	57450
黑 龙 江	907	3639	33464
上 海	5457	66335	42801
江 苏	2750	12165	33288
浙 江	822	4349	54786
安 徽	1442	3525	3831
福 建	997	29580	133373
江 西	1568	1590	3487
山 东	1270	3065	13092
河 南	1607	1668	8476
湖 北	2647	6591	6733
湖 南	2370	2153	5027
广 东	2950	18688	25508
广 西	575	1835	3565
海 南		580	790
重 庆			2064
四 川	4579	6084	9269
贵 州	1569	859	701
云 南	790	1277	219999
西 藏		159	156
陕 西	2947	3250	3400
甘 肃	693	1080	1017
青 海	24	223	393
宁 夏	576	456	225
新 疆	167	1152	2118
合 计	56930	237024	756726

资料来源：第三次人口普查系根据《中国第 3 次普查的主要数字》（中国统计出版社，1982 年 12 月，第 8、9 页）；第四次人口普查系根据《中国统计年鉴 1992》（中国统计出版社，1992 年 5 月，第 88 页）；第五次人口普查

系根据《中国统计年鉴 2002》(中国统计出版社, 2002 年 8 月, 第 100、101 页)。

在人口普查的说明中, 没有记载中国公民进行国际移动的原因、时间、国别等。另外, 人口普查中不包括前往香港、澳门、台湾等的“出境者”。实际上有不少人先到易于出国的香港, 不久再前往国外。如果想要弄清新移民的动向, 对这一方面的探讨也是很重要的。

改革开放后因私出国多是以从侨乡出去与海外亲属(华侨、华人)进行一家团员这样一种历史上形成的血缘、地缘、业缘为中心的出国、出境。

2. 自费留学生的增加与改革开放

改革开放后流往海外的人口特征之一是出国自费留学的骤增。人口普查表填写说明中也写有自费留学人员。但实际情况相当复杂。根据郭玉聪所述, 90 年代中期中国国家教委公布的赴美留学人员共有 10 万人, 但是美国公布的数字是 16.5 万人, 其差距有 6.5 万人。关于这一点, 郭玉聪认为其原因有如下 3 点: (1) 中国政府公布的统计数字仅是不包括陪读配偶的留学人员的数字; (2) 到国外读语言学校的(即就学生签证), 中国方面没有计入留学人员。而他们中约有三分之一的人员升入外国的大学; (3) 中国方面对自费留学人员难于进行准确的统计。根据上述情况, 郭玉聪认为美国方面的数字较为准确, 留学人员的实际数字应是中国统计数字的 1.65 倍(郭玉聪“新华侨、华人群体的形成及其特征”, 《世纪之交的海外华人》, 福建人民出版社, 1998 年)。

1992 年, 中国政府提出了“支持留学、奖励回国、来往自由”的政策。此后也有可能重新出国, 留学人员向新华侨华人的转化也达近 30 万人。

根据《北京周报》2004 年第 8 期(2 月 16 日-2 月 20 日), 1978 年至 2003 年留学人员累计总数达 700 200 人, 回国留学人员达 172 800 人, 以留学人员身分出国并在海外滞留的人为 527 400 人, 另有继续在海外学习、合作研究、学术交流的人 356 600 人。该报记载, 在 2003 年度的 117 300 名新留学人员当中, 自费留学生占了 109 200 人。

1983 年以前, 中国的出国留学基本上以公派为主, 进修及访问学者占了 80%, 攻读研究生的人还达不到 10%。1984 年 12 月, 国务院公布了“关于自费留学的暂行规定”, 打开了自费留学之门。1984 年至 1988 年期间, 公派留学和自费留学在中国出国留学人员中各占一半。1989 年以后出国留学便以自费留学为主了。

中国国家教育委员会于 1996 年 10 月公布了 1979 年以来的留学人员统计。根据该统计, 国家派遣的留学人员为 5 万人, 工作单位派遣的留学人员为 8 万人, 自费留学人员为 12 万人, 合计 25 万人。

此外, 根据国家教育部国际交流司的统计, 改革开放以来至 1999 年, 中国出国留学人员将近 32 万人, 加上以其他身分出国后转换为留学生的人有近 10 万人, 总计为 40 万人以上。在以留学为目的出国的约 30 万人当中, 公派的有 5 万人, 机关、单位派遣的有 9.4 万人, 自费留学有 16 万人。总计 40 万人以上的留学目的地为: 美国 16.5 万人, 日本 10 万人, 加拿大、澳大利亚各 6 万人, 德国 1 万人, 英国 0.8 万人, 美国、加拿大、日本合计占了 80% 以上。

正确把握中国留学人员（特别是自费留学人员）数量有很多困难，但自 20 世纪 90 年代中期开始自费留学人员每年约有 1 万人。进入 21 世纪后急速增加，2003 年仅一年自费留学人员就有 11 万人，超过了 10 万人。留学人员调查研究小组所具有的共同点之一是关于新移民留学人员的留学目的地比率的调查。1978 年至 1990 年代中期前后中国大陆留学人员的留学目的地有 52 - 56% 是美国，14 - 17% 是日本，加拿大、德国各占 8%，英国为 4%，法国为 3 - 4.4%，澳大利亚为 2 - 4%。

三. 从改革开放后的人口普查看出国状况

1. 从 1982 年的人口普查看出国状况

根据 1982 年的人口普查，当时有 56 930 人在国外，他们都是在 中国没有临时常住户口的中国公民。其中北京出身者为 12 565 人，在该市占了全体的 22%。

根据《中国人口·北京分册》（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1987 年 12 月），改革开放前首都北京市的海外人口移动因受到严厉限制，因此大部分是国家机关进行工作调动的移动。1973 年海外移居者（包括香港、澳门）的 58%、1975 年的 66% 都是出于工作调动。第二位是投靠亲友，1973 年占了 37%，1975 年占了 32%。

表 3 改革开放初期北京向香港、澳门及外国的人口移动（单位：人）

	1979 年	1980 年	1981 年	1982 年
纯移出	2 186	3 514	4 602	2 338
移 入	1 713	1 650	2 508	4 095
移 出	3 899	5 164	7 110	6 433

资料来源：《中国人口·北京分册》，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1987 年 12 月，第 179 页。

从表 3 看北京市 1978 年至 1982 年的海外移出人口，可以知道从 1979 年的 3 899 人增至 7 110 人，1982 年为 6 433 人，比 1979 年增加了。北京的海外移出人口的主要原因与移入原因基本一样，工作调动占了出国出境者的 50%（1982 年）。就 1982 年从海外移入北京的主要原因来看，工作调动占了 70%，第二位是留学海外的人回国，占了 26%。

从年龄来看北京市和海外的人员移动，移入和移出在 80 年代中期以前都以青壮年为主，1983 年，从海外移入北京的人 15 岁 - 39 岁占了 45%，其余的是 40 岁 - 59 岁的人。同年，就受教育的程度来看，在从海外移入北京的人当中，大学毕业占 72%，高中毕业占 11%，中学毕业占 15%；从北京市向海外的移出者来看，大学毕业占 50%，高中毕业占 17%，中学毕业占 17%，小学毕业占 14%，移入者和移出者都是大学毕业生最多。

就北京市向国外的移出目的地来看，1983 年发展中国家占了 69%，发达国家仅占 31%。反映了当时中国的对外政策比较重视第三世界。这是一个改革开放虽然已经开始，但国家管理的计划体制仍有着很大影响的时代。

下面来看看 1982 年的人口普查中仅次于北京市海外移出者的上海市（5 457 人）当时

的状况。根据《中国人口·上海分册》(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 1987年12月), 上海与香港、澳门、国外之间的人口移动1982年移入者为1740人, 从上海的移出者达到了7122人。其中, 从上海市区的移出者占了6750人, 这与1976年相比增加了7倍以上。在文革中的1973年从香港、澳门及国外移入上海的理由以“投靠亲友”和“回国定居型”为主, 两者占了90%。同年从上海市向海外移出的人中约50%是投靠亲友型。在改革开放后不久的1982年, 上海的国际人口移动为投靠亲友型据首位, 占移入的83.3%, 占移出的48.15%。1982年上海移往海外人口的37%是工作上的移动, 海外留学则占了14.81%。以工作上移动为由的人大多被派往发展中国家从事国家建设, 海外留学则主要去发达国家。

从人口普查来看北京、上海这两大城市在改革开放后不久的1982年的海外人口移动, 可以看到下列几个特征: ①当时国家的计划体制的影响仍然很大, 因此改革开放前的海外移动的主要原因——地缘、血缘造成的“投靠海外亲友”型的、与海外亲属团聚型较多; ②工作调动及公派留学等因“公”移动较多; ③当时中国的对外政策是重视第三世界, 因此海外业务也以前往发展中国家为多。

可以知道当时还不是可自由进行海外移民的环境。第三次人口普查的时候是国家管理的计划体制具有很大影响力的时代。因此第三次人口普查时“在国外工作或学习, 没有临时常住户口的人”的意思与之后的第四次(1990年)、第五次(2000年)人口普查时的内容大为不同。尤其是自费留学等自由流出方面更是如此。

如前所述, 正规的出国潮是在1986年实施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出入境管理法”以后出现的。通过该法, 中国公民因私出境受到了法律的保护。在1986年12月国家教育委员会公布的“关于出国留学人员业务的若干暂行规定”中, 规定允许包括外国及港澳台地区亲友给予资金援助的能够准备好外汇的自费出国者的申请。

就是说, 有必要根据包括自费留学在内的因私出国人员急速增加的80年代以后的人口普查, 对前往外国的出国状况加以探讨。因此, 根据1990年的人口普查, 可以知道往外国的移动状况与1982年人口普查时的结构完全不同的人员外流情况。从这一点来看, 1990年的第四次人口普查资料是很重要的资料。

2. 从1990年的人口普查看外流人口

从表2可以知道, 1990年人口普查时居住在海外(留学、工作)的中国人为237024人, 比第三次人口普查(1982年)增加了4倍以上。从1990年的第四次人口普查资料来看, 237000人输出地仅上海(27.9%)、北京(20.6%)、福建(12.48%)、广东(7.8%)这两省二市就占了近7成的69%, 偏重于特定的省、市, 即大城市和侨乡。

包括第四次人口普查, 各次人口普查对外流人口几乎都没有加以说明。但第四次人口普查指出, 新移民的特征之一是教育水平很高。全国的居民平均教育时间为6.43年, 而新移民的平均教育时间为13.0年, 要高得多。

上海市的居民平均教育时间为8.5年, 而该市新移民的平均教育时间为13.3年。上海市新移民整体的35%是大学本科毕业, 加上比高中毕业高的中专和大专, 达到了58%。北京市也是新移民的教育水平较高。北京市的居民平均教育时间为9年, 而新移民平均教育时间为14.9年。其中大专、大学本科毕业占了82.4%。表4具体列出了1990年两省二

市的新移民教育水平。

表4 1990年两省二市15岁以上移民的教育水平(单位:%;年)

	文盲、 半 文盲	小学	中学	高中	中专	大专	大学 本科	移民平均 教育时间 (年)	移民平均 教育时间 (年)
北京	0	1.89	2.91	9.01	3.78	10.17	72.24	14.9	9
上海	0	0.92	15.68	24.91	8.3	15.13	35.06	13.3	8.5
福建	0.62	23.22	33.44	29.41	2.48	3.1	7.74	9.9	6.1
广东	0.61	1.83	11.59	21.34	3.05	25	36.59	13.5	7
全国	0.42	7.1	16.39	17.23	5.38	11.3	42.18	15	6.43

资料来源:黄、鲍、刘:“近十年我国大陆海外新移民”,《人口与经济》,1998年第1期,第22页。

从第四次人口普查(1990年)时居住在海外(留学、工作)的中国人状况来看,第一位是上海,56336人,第二位是北京,48956人,第三位是福建,29580人,第四位是广东,18688人,第五位是江苏,12165人。第一、二位的上海、北京是大城市,从表4可知,新移民的教育水平很高。第三位福建省的居民和新移民的平均教育时间没有达到全国平均水平,但居住在外国的人却比其他省多。因为福建是代表性侨乡。广东省也同样是代表性侨乡。这些侨乡省份历史上为投靠海外亲友、“探亲”的移居海外者和归侨很多。第五位江苏省的海外移居者也是出于同样理由,其新移民大部分从温州、青田等侨乡出去。

三. 从2000年的人口普查看国外侨居者

从第五次人口普查来看海外侨居者,如表2所示,比第四次人口普查时增加了3倍以上,为756726人。从2000年第五次人口普查时的海外侨居者人数来看,其与第四次人口普查的差异有如下几点:

(1) 云南省的国外侨居者人数的算法

首先,第一位的云南省219999人在第四次(1990年)人口普查时仅有1277人,10年期间骤增了172倍以上,令人难以置信。云南省不是华侨华人输出地。根据李原等编的《海外华人及其居住地概况》(中国华侨出版公司,1991年5月),云南省的海外华侨华人数量1990年时为19.5万人(广东为1940万人、福建为700万人),归侨和该省的侨属为26万人(广东为1500万人、福建为520万人)。

即使从云南省的教育水平来看,也很难认为该省的海外留学人员2000年出现了骤增。一般说来,往海外的外流人口如果不是侨乡,那么城市地区的移出者要比农村地区多。特别是省会的外流人口很多。但是,从云南省省会昆明来看,并非如此。1990年的第四次人口普查时,“因在国外工作或学习没有临时户口的人”在全部云南省的1277人当中,昆明达1025人,占了80%。在云南省2000年人口普查时公布的国外侨居者人数约22万人当中,来自昆明的“因在国外学习没有临时户口的人”仅有1255人。

从 20 世纪末到 21 世纪，中国对印度支那地区的发展援助和投资不断增多，而对缅甸的支援尤为显著。根据《日本经济新闻》对当地的报道，缅甸的中部城市曼德勒从 1994 年前后开始便由中国人不断建筑高层大厦，街上充斥着中国制造的商品，在曼德勒经商的缅甸国籍的华人在云南省也有许多亲戚朋友，他们靠这种人际关系经商。从云南省前往缅甸、泰国等国的打工者不断增加，这从近年来前往当地调查的研究人员那里也听说过。即使从这一点来考虑，云南省 2000 年人口普查时居住在海外的人数也相当多。从以上情况来看，关于云南省在外人数的人口普查数值在使用时值得注意。

(2) 东北 3 省的外人数和往俄罗斯的外流

2000 年人口普查时东北 3 省的情况似乎与云南省一样。第三位吉林省的海外居留者为 38 908 人，比 1990 年人口普查时的 7 261 人增加了 5.3 倍以上，第八位黑龙江省的海外居留者为 33 464 人，比 1990 年人口普查时的 3 639 人增加了 9 倍以上。东北 3 省作为侨乡并不出名。根据前述李原的《海外华人及其居住的概况》，就 1990 年前后归侨、国内侨眷人数来看，黑龙江省为 26.5 万人，吉林省为 1.0 万人，辽宁省为 5.5 万人。东北 3 省海外华侨华人的主要居住国是日本和北美。在辽宁省 1954 年至 1982 年 10 115 人的国际人口移动中，去北朝鲜定居的人有 7 823 人，占全体的 77%，去日本的人有 1 129 人，占全体的 11%。去日本定居的 98% 是在实施改革开放政策以后。在对外开放后的 1978 年至 1982 年这 5 年期间，从辽宁省流往国外的人口合计有 1 624 人，其中去日本定居的有 1 120 人左右。第三次人口普查时，辽宁省移居国外的人口达到了 2 099 人，可以认为其大多是前往日本的。主要原因之一应该与残留在中国的日本人遗孤有关。根据《中国人口·吉林分册》（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1988 年 10 月），1982 年的第三次人口普查时，吉林省的“去国外工作或学习、没有临时户口的人”为 552 人，人口的国际移动非常少。

下面从《中国人口·黑龙江分册》（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1989 年 4 月）来看看黑龙江省移往外国的人口。黑龙江省从地理上看，北接西伯利亚，东南是朝鲜半岛，离日本很近。根据 1954 年的统计，该省的苏联侨民有 39 579 人，1955 年至 1959 年期间有 3.6 万人回到苏联。新中国成立后，来自北朝鲜的归侨很多。1952 年有 4 706 人、1953 年有 7 444 人从朝鲜回到黑龙江省。其大部分被分配到农村，分到城市的很少。在出国方面，黑龙江省从 1976 年至 1983 年的“文革”末期到改革开放初期的出国定居者为 3 802 人。其大部分是国家派遣的公务人员。改革开放初期之前，因私出国人员很少。（表 5）。

从以上东北 3 省的 80 年代初期的状况，如何理解 2000 年第五次人口普查时的移往国外的人口骤增的情况呢？

从第三次人口普查至第四次人口普查的外流人口来看，辽宁省从 2 099 人增至 7 261 人，吉林省从 552 人增至 2 744 人，黑龙江省从 907 人增至 3 639 人。这些增加与中国全国的增加率 4.16 倍没有什么大的不同。

2000 年人口普查时东北 3 省外流人口骤增的原因是什么？与云南省一样，数值的可靠性值得怀疑，但可以考虑的是从东北 3 省大量流往毗邻的俄罗斯打工和日本人遗孤等大量移居日本的可能性。就日本人遗孤回国定居来看，他们从中日邦交正常化后的 1974 年开始查找亲属，1984 年日本成立了定居促进中心，遗孤便开始正式回到日本，至 2003 年底已有近 2 500 人回到日本定居。从数字来看，日本人遗孤的回国并不是东北 3 省外移人口

骤增的主要原因。但 2002 年底在日东北 3 省人达到了 127 000 人，甚至占到了在日中国人总数的 33.5%，这是事实。

表 5 黑龙江省的出国人数（1975—1983 年）

（单位：人）

年份	1975	1976	1977	1978	1979	1980	1981	1982	1983	合计
人数	110	107	491	234	345	471	680	1 032	1 496	4 966

资料来源：《中国人口黑龙江分册》，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1989 年 4 月，第 173 页。

进入 21 世纪后，中国人移往俄罗斯的许多报道也许与东北 3 省的外流人口有关。赵定军、李效生的论文（“历史与现实：中俄边民跨境流动的社会因素分析”，《人口研究》，2003 年第 3 期）就 21 世纪初以前的中国、俄罗斯边境的流动人口进行了历史的考察，意味深长。根据赵、李的论文，1893 年俄罗斯远东地区的总人口为 90.84 万人，远东的外国人为 3.55 万人，其中中国人 2.89 万人，朝鲜人 0.55 万人，日本人 700 人，欧洲人 500 人。1900 年开始为了开发西伯利亚农业，请进了大量的中国人，1910 年底 15 万中国人常住于俄罗斯。从 1911 年开始为了建设俄罗斯远东的军事设施及军港，募集了 2.4 万名中国人。1913 年，在俄外国人总数当中，中国人占了金矿业的 87.6%、森林采伐业的 67.1%、港湾业务的 57.8%、铁路建设的 53.3%、乌苏里江运输业的 32.8%。

20 世纪 90 年代，在中国和俄罗斯的边境又迎来了民间人员流动的高潮。1993 年，在俄罗斯接待的总计 75.1 万名中国人当中，有 41 万人是公务活动，23.7 万人是购物旅游者，3.34 万人是个体商人，5.71 万人是从事运输的。居住在俄罗斯的中国籍常住人口有了急速的增加。根据俄罗斯政府的统计，中国人在俄罗斯远东地区的常住人口 1989 年为 1 742 人，1990 年为 1.5 万人，1993 年为 10 万人，2001 年为 23.7 万人。

俄罗斯的远东（西伯利亚）地区由于劳动力不足和资源开发上的需要，即使到了 21 世纪，对外国劳动力的依赖性仍然在提高，并没有减少。俄罗斯的远东地区面积占了全俄罗斯的 36.4%，但人口 1998 年 1 月 1 日仅有相当于全俄罗斯人口 5% 的 733.63 万人。1991 年苏联解体后，远东地区的收入水平有了下降，为此从该地区外流的人口不断增多，原来人口就少的地区便愈发减少。进而由于该地区老龄人口的增加，俄罗斯远东地区越来越缺乏劳动力。1998 年俄罗斯远东地区的人口比 1991 年减少了 72 万人，预计 2010 年将减至 674.7 万人，2015 年减至 661.2 万人。另一方面，俄罗斯远东的天然资源很丰富，可采伐木材林为 213 亿立方米，工业用石油蕴藏量为 3.27 亿吨，天然气为 15 976 亿立方米，海洋生物资源为 2 600 万吨等，以天然资源的宝库而闻名。

天然资源开发所需的劳动力也许大多依赖外国劳动力、尤其是毗邻俄罗斯、拥有过剩劳动力的中国东北部。辽宁省所代表的东北地区的大型国有企业拥有大量的失业人员。东北 3 省的失业人员及青壮年劳动力一部分去开发西伯利亚，或前往西伯利亚和中亚跑单帮，这是容易理解的。20 世纪 90 年代中期实际上看到了几次民间边境贸易（中国的黑河及绥芬河等）的发展。

根据前述的赵、李的论文，在 1992 年 1 月叶利钦时代，俄罗斯当局准备在纳霍德卡、

萨哈林岛等设立自由经济区，在布拉戈维申斯克和中国黑河之间也准备设立自由经济区。其后，中国、俄罗斯政府之间签订了劳务协定、中国劳务出口合同，在法律上具有了计划性和保障性，来自中国的合同劳动开始实施。中俄劳务合作（中国向俄罗斯出口合同劳动力）从1990年的1万人增加到了1992年的1.8万人。其中46%从事建筑业，47%从事农业。1994年为20301人，其中工人为9126人，从事农业的人为6506人。1995年为26528人，1996年为24043人，1997年为22227人，均在2万人以上，但2000年增加到了3.5万人。这是因为根据中俄的政府间协议，劳动力从中国往俄罗斯远东移动的缘故。俄罗斯方面支付给中国人工人、农民的工资不是直接支付给中国工人，而是支付给中国的劳务公司。因此，个体黑市商人及从事运输的中国人不包括在上述数字中，所以实际上流入西伯利亚的中国人要比上述数字多得多。如前所述，俄罗斯方面的资料记载，中国人在俄罗斯远东地区的常住人口：1993年为10万人，2001年增至23.7万人。有的俄罗斯人口学家预测，21世纪中期前往俄罗斯的中国人移民将从700万人增加到1000万人。

根据新华网消息，2002年出国、出境的中国公民总计1660.23万人，比前一年增加了36.84%。出国、出境目的地的前五位是，第一位香港，第二位澳门（以上为出境目的地），第三位日本，第四位俄罗斯，第五位泰国。俄罗斯为第四位，作为出国目的地仅次于日本，列第二位。2003年大陆出国、出境人数总计为2020.46万人，其出国、出境目的地的前四位同样是香港、澳门、日本、俄罗斯。出国、出境的理由很多，分别是会议、商务、观光旅游、探亲等。总之，进入21世纪后，前往俄罗斯的中国人无疑在增加。

（3）浙江省2000年人口普查时在国外人员的骤增

浙江省的临时海外居住者（海外留学、工作）从第四次人口普查时的4349人骤增到第五次人口普查时的54786人。从顺序来看，从整个中国的第九位（第四次人口普查）迅速上升到了第四位（第五次人口普查）。而且浙江省是新移民显著增加的省份。

根据第四次人口普查（1990年）的资料，当时浙江省“因在国外工作或学习没有临时户口的人”的数量为4349人。其中男性2995人，女性1354人。最多的输出地是杭州，达到了2448人（男性1650人，女性798人）。温州市整体为713人（男性405人，女性308人），其中鹿城区最多，为300人（男性178人，女性122人），文成县为125人（男性66人，女性59人），瑞安市53人（男性31人，女性22人），永嘉县169人（男性87人，女性82人）。丽水地区为79人（男性66人，女性13人），其中青田县仅有7人（男性5人，女性2人）。此外，过去有名的华侨输出地宁波为419人（男性291人，女性128人），舟山市284人（男性269人，女性15人），台州地区为117人（男性103人，女性14人）等。

就2000年的第五次人口普查来看，浙江省整体的“因在国外工作或学习没有临时户口的人”为54786人，男性28844人，女性25942人。就人数占多的市、县来看，最多的是温州市，为25251人（男性13832人，女性11419人），约占浙江省全体的一半。丽水市次之，为9283人（男性5394人，女性3889人），接下来是杭州市6135人（男性2972人，女性3163人），宁波市5039人（男性1919人，女性3120人）。在2000年第五次人口普查中，温州市和丽水市两市就占了浙江省整体“因在国外工作或学习没有临时户口的人”的63%。

在温州市的 25 251 人中，文成县最多，为 9 991 人（男性 5 670 人，女性 4 321 人），瑞安市次之，为 6 254 人（男性 3 451 人，女性 2 803 人）。在丽水市的 9 283 人中，青田县最多，达到了 7 902 人（男性 4 715 人，女性 3 187 人）。与各地的新移民数相比，情况如何呢？温州市的领取护照出国者 1990 年为 8 607 人，是 1990 年人口普查数字 713 人的 10 倍以上。此外，往香港、澳门、台湾的出境者有 639 人。青田县实际上在改革开放开始后至 1986 年，年平均 1 368 人移居海外。与 1990 年人口普查时的 7 人大为不同。

人口普查中所说的海外居留者的范围是以在海外留学、在海外工作（包括在中东从事油田工作、在远洋轮船上的劳务出口）为主体，不包括定居移民及海外旅游等。当然也不包括偷渡者。像浙江省这样海外留学少的省份，与 1982 年第三次、1990 年第四次人口普查相比，似乎反映了省内新移民的动向。

具体就丽水市青田县来看，根据以青田县的信息为依据的论文，在 2000 年 1 年期间，该县出现了 3 万人以上的新移民。2000 年，在浙江省人口普查时的丽水市青田，“因在国外工作或学习没有临时户口的人”为 7 902 人，与该县实际上的出国人数大为不同，在丽水市整体的人口普查数值 9 283 人当中，仅青田县就有 7 902 人，作为一区 8 县中的一个县占了 85% 以上。出国目的与以往一样是出国打工，并不是留学。仅从改革开放初期至 1980 年代前期，便有年平均 1 360 人以上前往欧洲。可以认为，这些移民在得到居留权等之后，在 2000 年人口普查时通过正规渠道将国内的同乡、亲属叫到身边。

我们已经看过温州市 2000 年人口普查时海外居留者的人数，温州市整体 1998 年取得护照的出国者（包括往香港、澳门、台湾的出境者）达到了 26 017 人。据说直到 21 世纪，温州市的新移民热并没有降温。从文成县的新移民潮、瑞安县的新移民动向很容易就能了解到新移民的出国要比温州市 2000 年人口普查时的 25 251 名海外居留者多。仅 10 年期间，温州市的“因在国外工作或学习没有临时户口”的人数便从第四次人口普查时的 713 人增至 25 251 人，增加了 35.4 倍。大幅度增加的地区有：文成县从第三次人口普查的 125 人增至 9 991 人，增加了 79.9 倍，瑞安市从第四次人口普查时的 53 人增至 6 254 人，增加了 118 倍。可以认为其原因之一与青田县相同，改革开放开始后，文成县和瑞安市的新移民先驱前往欧洲等地，其后通过大赦获得居留权，然后通过血缘、地缘、业缘网络，通过正规渠道从故乡温州把亲友叫到国外。也就是说，就浙江省来看，可以说 2000 年人口普查的数值反映了该省以欧洲为中心的新移民正在增加的实况。

（原载山岸猛著《侨汇——现代中国经济分析》，日本论创社，2005 年 10 月）

司 韦 译